



左图：巴黎和会。  
上图：五四运动。

使处于战胜国的地位，当时的中国还是不够强大，仿若“战利品”一般被瓜分国家利益令人愤怒，也令人无奈。但仔细一想，正如顾维钧所言，“我不相信弱国无外交之说。唯其弱，故依赖外交较强国更为重要”。

对此，杨成也颇为赞同，“弱国更要有外交，但除此还应该再加上半句，即弱国外交有限度”。

“无论是从绝对还是相对国力的视角看，当一个国家处于弱势地位时，能否拥有卓越的外交家就显得特别重要了。在硬实力不如他国时，谈判桌上能否尽量为本国争取利益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外交技巧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可能也要承认，弱国外交毕竟是‘螺蛳壳里做道场’，技巧是有边界的，很多情况下其目标首要在于把国家利益的损失降到最低。换言之，弱国外交只能想方设法保证一些基本利益，缺少国家实力的战略加持不大可能做到利益最大化的最优结果，这是弱国和强国外交的一个最明显的差别。”杨成进一步解释道。

同样地，国际政治专家项蓝欣在《传统与对外关系》一书中也反复强调过“弱国无外交”这一想法是不对的。书中写道，“弱国有外交”就意味着对我行我素的超级大国的行动限制。中国必须反对“顺者昌，逆者亡”的国际关系的所谓“规律”，同时加强对世界通行“规则”的遵守和新规则的制定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中国才能算是进入了世界政治的主流。

曾经做过外交官的杨成坦言，外交谈判其实是一门非常难的技术活，除了心理战，有时甚至还是拼体力的活儿。他本人就曾作为中方的学者代表参与过和俄罗斯的谈判，“当时在整个谈判周期内每天都从早上9点开始，一直要谈判到晚上12点，围绕着每一个条目来回展开拉锯战。双方都会据理力争，

争取说服对方接受己方的立场”。

而两国谈判会有很多所谓的技巧。“事先尽可能摸清对方的谈判文化、基本立场、核心利益等至关重要，据此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。更关键的在于现场的随机应变能力，准备的毕竟不大可能全用上，很多时候需要根据对方临时的立场做战略判断，政治定力、语言能力、学科能力、话语能力在彼时彼刻十分重要。该下决心时不能犹豫，该拖的时候也要能够拖得合情合理。”在杨成看来，“外交本质上是一门妥协的艺术，是双向的让步，最终目标是要解决现实的外交问题，无论是事关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，还是和民众相关的侨民保护等看上去不起眼的小问题。他强调：“作为谈判者，我们肯定是力争对我方最有利的上线方案，但心里也是有底线思维的，根据战略大局的需要可以做适当的让步。此时的基本技巧是换子，在某个地方退了一步，在别的地方要找补回来。谈判双方对此是有一定的默契的，或者更准确说是都清楚这一逻辑。除非两国之间有绝对的实力差距，一方可以借此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另一方。一般来说，围绕谈判目标出现一些拉扯十分正常。”

因此，在国力上升，尤其是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，外交相对更容易做。杨成表示：“仅凭一张嘴皮子，在列强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坚决地维护国家利益。从这一层面来看，无论是李鸿章还是顾维钧都殊为不易。”

## 从窑洞走向国际舞台

巴黎和会的打击为当时的中国敲响了警钟，郁积近百年的